

—桑兵
张凯
於梅舫
编—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

JINDAI ZHONGGUO XUESHU SIXIA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解 说

今人所谓学术思想史，大都各人的见识，而不等于历史的事实。不仅后人的著述如此，即使当事者的记录，立场不同，看法各异，至多只能存此一说，反映了史事的某些方面，而不能断言全部事实就是如此或只是如此。之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原因还在各人所处位置及其见识的远近高低各不同，时空位置有异，心中形象有别。将高下之分认作见仁见智固然有害，高明者的英雄所见略同之下，也不止是小歧，梁启超与钱穆关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看法迥异，便是显例。要在走马灯式的历史图卷和万花筒般的历史认识中学会四面看山，八面受敌，从你方唱罢我登场发现联系脉络，由语境理解文本，可以说是解读前人本意及内在理路的不二法门。由此可以借助其他工具，而不是用各种外来后出的架构肢解前人思想，再度拼装组合，而美其名曰重新条理史事，从而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古人真相愈远的陷阱。历史真相实在，这一客观包含无数前人的主观，所以后人可以不断接近，却不能完全重合。在此过程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避免主观任意性，把握前事之形，了解前人之心，对于学人的智慧与耐力，无疑是严峻的考验。

基于上述认识，本编不拟在众说纷纭中徒增新说，亦非将课堂讲义当作著述，以为天下庸众，可以尽欺，而是尽可能多角度地提供前贤的见仁见智，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评判者，所议当否姑且不论，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看法和意见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通过诸如此类的前后左右彼此参合，虽然未必能够完全和恰当地把握近代思想学术的史事及流变，至少可以跳出单向度的一孔之见，将一种认识误认为历史真实的全体。循着以俱舍宗看俱舍学的语境式解读，可以逐渐接近历史的本相，理解前贤的本意，并提升学术的判断力和鉴赏力。

史无定法，而好的办法至少有两条准则：其一，有实效。凡不能付诸实

践或无法取得预期效应者，要么本来无用，要么鼓吹者错解。其二，难度高。后出方法意在超越前人，若能为己之后为人，穷尽前人方法之效而上之，必定难度极大。否则，只是面向青年后学，甚至一般大众，至多拾遗补阙，甚或自欺欺人，难免随风飘过，陷入所谓趋时者容易过时的循环往复。作固然须心存高明，述也不能等而下之。而个人治学，须向极高明处，教书却面对后来浅学者，只能循序渐进。要想深入浅出而不逾矩，相当困难。这也是晚近以来大家所预测指示的途径趋向往往和者盖寡，横逸斜出的标新立异却从者如云的重要原因，看似异相，实为正常。所以前贤要“但开风气不为师”，尤其不愿仅为“青年导师”。

执教至今，一直开设近代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课程，按照今日分科治学的观念，此为一门三级或四级学科的内容。而本意则旨在讨论一般读书和治学的门径，决不以分科治学，尤其是在分科之后再分段分类（如什么什么史、什么什么学）的畛域自囿，更不鼓励后学以占山为王为夺取制高点，作草头王式的割据称雄，以免学术侏儒时代的恶名进一步恶化。晚清以来，读书逐渐变为读教科书，而教科书的体例编排又往往取自域外，遂养成不由教科书的概念即无法读书的怪象，流弊深远，误以为教科书对于历史的描述就是历史。加上多将前人著述当作史料，不见作者的主观用意，所有的意思必须以后来观念重新认定，更加积重难返。此外，要推动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的习惯，不要将大学读成高四至高七，由耳学而眼学，主动进图书馆博览群书，这一环节至为关键。多数抱怨在大学未学到知识者，原因之一，是不了解大学与中学的区别，仍然延续应试教育之下高中时代的学习方式，没有实现应有的转型。大学教师的职责，主要是明道，即探求指示学问整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而非照本宣科式地讲授。若学生不问学，便只能盲目施教。所以，这门课程只有大范围的参考书目，而没有教科书或固定化的讲义，目的在于逼学生去图书馆读书，形成自己对于历史和学问的看法，而不是仅仅在课堂上听授教科书，这也是避免章太炎预言大学不出学问的可行之道。

近两年在两岸三地继续教授此课，却面临新的难题，大学须有好的图书馆和好的师资，有钱虽能请人，却很难建设有长期积累传统的图书馆。尝戏

言大学唯一增值的就是图书馆，其余包括所谓高科技在内，都是高投入高消耗。而后设的大学图书馆，所开列各参考书以及数量繁多的近代中国书刊，收藏有限，借阅困难。当然，学生不会进图书馆找书，不喜欢看书，也是重要原因。目前网上所有的文献资源，其实相当丰富。而某地媒体调查，大学生每天阅读时间不到一小时。为此，感到有必要编辑一本前贤相关文章的汇集，作为教科书使用，以解决找书难和不会找的问题，同时可以提供一个如何看待学问和历史的范例，去除成见，网罗资料，前后左右，探求本意。或曰，用一种观念看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事，历史就是教会人们相对、具体地看问题。有鉴于此，本编旨在方便初学者，希望循此看书，而不要以此代书。所收各文当然已经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相关历史的看法。为了便于理解前贤本意，贯彻本编初衷，总体提供四面看山的视角而外，每篇再列若干参考文献，以利于读者引伸阅读，比较鉴别，理解判断。若能从前贤关于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的见仁见智看出读书治学的正途大道，而不仅仅了解所谓学术思想史的史事与线索，则为幸事。

本书编辑，弟子张凯、於梅舫承担了主要的具体工作，包括参与正文和参考文献的选取。正文尽量根据最早的底本，并参照其他各版，有所校勘。所选各篇，虽然均有一定的代表性，尚不能覆盖整体，挂一漏万的偏蔽在所难免，加之版权与著作权法的限制，一些高论无法纳入，今后当随时调整，以臻精当。

桑兵

2007年1月23日

目 录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	1
梁启超：新史学	7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节录）	35
邓 实：国学今论	65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78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	82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87
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	99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	117
胡 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节录）	133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162
胡 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169
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	181
甘蛰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蠡测	185
章太炎：救学弊论	208
显 教：中国佛学界最近思潮之观察	215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	221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节录）	23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25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261
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	265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节录）	270
朱谦之：《现代史学》本刊宣言	284
冯友兰：哲学在当代中国	290

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	295
马一浮：泰和会语（节录）	311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	323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335
程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	383
童书业：新汉学与新宋学	387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391
钱 穆：《新亚学报》发刊词	429
附 录	436

今古文辨义

章太炎

自刘申受、宋于庭、魏默深、龚璩人辈诋斥古文，学者更相放效，而近世并研廖季平始有专书，以发挥其义。大抵采摭四人，参以心得。四人者，于《毛诗》、《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率攻击如仇讎，廖氏则于四知皆加驳斥，而独尊左氏，谓不传《春秋》，正群经之总传，斯其异也。其《群经凡例》、《经话》、《古学考》等书，虽所见多偏戾激诡，亦由意有不了，迫于愤悱之余，而以是为强解，非夫故为却偃以炫新奇者。余是以因通人之蔽而为剖释焉。

综廖氏诸说，一曰经皆完书无缺，以为有缺者刘歆也。一曰六经皆孔子所撰，非当时语，亦非当时事，孔子构造是事而加王心也。一曰四代皆乱世，尧、舜、汤、文之治皆无其事也。一曰《左氏》亦今学，其释经亦自造事迹，而借其语以加王心，故大旨与《公》、《穀》同，五十凡无一背《公》、《穀》也。一曰诸子九流皆宗孔子也。夫廖氏之意，特以宰予尝言夫子贤过尧、舜，苟六经制作，不过祖述宪章，知尧、舜固为作者之程，而孔子特为述者之明，恶得以加于尧、舜之上哉？于此思之不通，则尽谓尧、舜事为虚，而以归之孔子，然后孔子为生民所未有，而群疑皆析矣。及后又得一证，观春秋时公卿大夫烝报残虐，降至而秦、汉以后，斯风渐熄，则意三代以上，其渎乱无人理，必更甚于春秋，而尧、舜、汤、文，遂可一扫空之，至此则其守愈坚矣。古文逸经多谓出于周公，是则六经为周、孔并制，孔子又不得为生民所未有也，于是谓逸经皆刘歆所伪撰，而孔子乃尊无二上矣。《左氏》述当时事，有极丑恶者，亦有极嘉美者，意春秋既为乱世，则必不

得有此美谈，于是谓《左氏》亦自造事迹，而非征实之史。九流自儒家而外，八家所说古事，虽与经典不无齟齬，而大致三代以上，圣帝明王名臣才士亦略不异于群经。且嵬琐小事，亦有与群经合者。使其各为一术，则孔子以前，坟典具在，孔子不能焚去其籍也，彼诸子者，何为舍实事不言而同于孔子虚拟之事乎？于是词穷，则不得不曰庄、墨、申、韩皆宗孔子也。至此则欲摈古文于经义之外，而反引珍说于经义之中；欲摈尧、舜、周公不得为上圣，而反尊庄周、墨翟为大师，则亦仅可鹬突其词，敷衍其语，而于心终不能安，于理终不能晰矣。综其弊端，不过欲特尊孔子，而彼此牴牾，疑义丛生，故不得不自开一径耳。

余则解之曰：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昔人言禹入圣域而未优，斯禹不如尧、舜也；颜渊言欲从末由，斯颜不如孔也。此其比较，皆在性分之内，岂在制作哉！惟然，故惟宰我、子贡、有若辈亲炙者知之，而孟氏则去圣已远，未尝亲睹其气象，故必引三子之言以为证。若制作六经，则孟时全帙具在，以此证其优于尧、舜，自可言从己出，何必远引三子哉？孟言伯夷、伊尹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是则定太平、制礼乐，夷、尹与孔子同此能事矣，而又言二子不能与孔子相班，然则孔子之所以超越千古者，必不在制作可知也。尧、舜、周公适在前，而孔子适承其后，则不得不因其已成者以为学，其后亦不得不据此删刊以为群经，此犹姜桂因地而生也，而其圣自过三人，此犹姜桂不因地而辛也。夫青胜于蓝，冰寒于水，智过其师，亦何足怪！

然即以群经制作言之，《春秋》自为孔子笔削所成，其旨与先圣不同，即《诗》、《书》亦具录成、康后事，其意亦不必同于尧、舜、周公矣。惟《易》与《礼》、《乐》，多出文、周，然《易》在当时，为卜筮所用，《礼》、《乐》亦为祝史瞽蒙之守，其辞与事，夫人而能言之行之也。仲尼赞《易》为十翼，则意有出于爻象之外者。今七十子传微言于后学，而为之作《记》，则意有出于《礼》、《乐》本经之外者。注《礼运》、《礼器》、《仲尼燕居》、《三朝记》等篇，非《士礼》、《周官》所能尽也。《乐》亦可知。至于《记》中制度有异二《礼》，则自为孔子制作，兼用夏殷，然不去二《礼》以存其异者，通三统也。夏殷之礼不存者，文献不足征

也。是故经皆孔子之经，而非尧、舜、周公所得据，然彼所以圣过数子者，当不在是。自唐以后，太学遂罢旦而记尼，亦以孔子圣德，自可度越前哲耳。岂以为《士礼》不出周公，而《周礼》又当摈绝哉？然则孔子自有独至，不专在六经；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知此则诸疑冰释，以下无庸再解矣。

然犹必解之者，则以世儒或不明廖氏本旨，而反取其支流以为根据也。春秋时事，秽浊不忍闻，大半皆出君相，此事非秦汉以后所无也。郡国守相，藩镇将帅，亦与古诸侯同。特封建之世，国皆有史，故秽事流传；郡县之世，非天子不得有史，故其事隐秘。不然，齐文宣、隋炀帝、唐太宗、玄宗、梁太祖及元世诸主之淫昏烝报，皆与春秋时事不殊，其君有之，而谓其将吏无之乎？封建变而为县，若弑君则秦汉以后，只奉一共主，固宜其少。然郡则诸侯变而为守令，杀守令亦犹弑君也。明亡以来，与春秋年数相当，历数成案，戕官之事，何止弑君三十六乎？而骨肉相残，如两江总督噶礼之谋鸩其母者，更不足论也。要之，此在法令修明与否，而不专在教化，春秋时法令不如汉、唐、宋、明盛修明，故有此渎乱事耳。若教化固犹此教化也，有此教化，而上之人不能使昭明，斯法令不修之罪也。五帝四王在上，及幽、厉以前小康之世，固无此渎乱矣。而据此逆推，谓三代皆无教化之乱也。何其诬也！

且廖氏又曰：《山海经》，真禹制也，而《禹贡》为孔子之书；《穆天子传》，真周事也，而本纪多弟子所传。夫如是，则《山经》、《穆传》所载神仙妖鬼，乃真确有其事矣。是愿专此教，而反为神仙妖鬼诸事立一实证，虽孔子亦无说以斥其夸诞也，则其说适为淫词助攻之柄而已矣。《左氏》借古义美词以释经，余亦尝有是语。其言曰：陆元朗之叙《庄子》也，曰辞趣华深，正言若反；吕成公之论《史记》也，曰文见于此，起义于彼。以此读《左传》，则大通矣。然所谓古义美词者，皆当世自有其言，特左氏缀集以释经耳。且事本不为经发，而左氏则借之以申经义，故常有文在彼传，而实以申此经者。若使左氏自造，则不必为此隐见回曲之辞，而不妨于本条之下直造斯语矣。且苟其古义美词，皆非实有，则所谓烝报残虐者，亦安足据哉！

大抵《左氏》以事托义，故说经之处，鲜下已意，而多借他处之义以释之，故其意最为难知，而其功亦如集腋馥材，非二百四十年之遗语，不足以回旋其意也。即孔子作《春秋》，何独不然？苟曰拨乱世以成升平，由升平以成太平，则王者布政不过一世，而民已无不仁矣，何待二百四十年乎？惟《春秋》非二百四十年则行事不备，无以为法戒，亦犹《左氏》非二百四十年则嘉语不备，无以相证解耳。然则孔子著经，亦若兼为传人地者，故曰经之与传一体相成，共为表里也。若因服注季札观乐事，云传家据已定言之，遂谓《左氏》他事，亦皆取六经微言大义以裁成之，是则单文孤证也已矣。《左氏》非剿袭国史，其笔削去取之功勤矣，于此偶从已定言之，此《左氏》之文，非国史原文可知，要非于国史之外自撰事实也。至三传大旨，自有相同，而其异者终若瓜畴芋区之不可念。廖氏见近世治《公羊》者，皆明斥《左氏》，而不明斥《穀梁》，然《穀梁》之异于《公羊》，不下《左氏》，而诸儒意见偏枯如此，则不如并《左氏》而进之，且均以为今学也。以廖氏识见卓绝处，亦正其差池处。

盖同为今学，十四博士其异同犹不可更仆，如韩太傅说《诗》，《艺文志》谓其与齐、鲁间不同，此即其见端也。三传同者自同，异者自异，穿穴鑿凿以相比附，亦何不可！要之，离则双美，合则两伤，调人刘兆，甚无谓也。至于诸子分流，自出畴人散乱之后，家各承其旧学，更相衍说，以成一派，与孔子何与。此不必辨者，廖氏亦不能求其安隐也。即如墨子专与仲尼立异，巧文丑诋，孟、荀皆欲放拒之，此必不能谓其宗孔也。其他虽褒贬互见，要亦如儒家之取老聃，非宗之也。宋世苏氏，学最疏陋，以其牧豎兔园之见，谓庄周尊崇儒术。明世陋者，复扬其波，如《庄子雪》等书是矣，斯何足效乎？谓经皆完书者，以秦焚《诗》、《书》，未及博士所藏耳，不知荀子言秦无儒矣。伏生适通《尚书》，其余博士，非书通经术，彼时固以博士备顾问，非如汉博士之为经师也。古者书无雕本，非儒生献书，其书无由入官。《周礼》之不传于汉初，《礼经》之有逸篇三十九，正以秦无其儒，故博士无其书耳。且酈侯所收，止丞相御史府图籍，此当时政书，与博士之《诗》、《书》何涉？其后咸阳焚于项羽，则博士所藏，亦庸能传布乎？以此

未杀古文，未见其可也。

廖氏谓今文重师承，古文重训诂。惟重师承，故不能自为歧说；推重训诂，故可以由己衍解，是亦大误。大小夏侯，同出儿宽，而彼此相非。王式《鲁诗》，江公《穀梁》，皆近本申公，而丑诋狗曲。至《诗纬》本于《齐诗》，而言《诗》含六情五际，绝于申，申者，谓申公也，则齐、鲁《诗》亦如仇敌矣。其相忌克如此，安能恪守师说乎？苟专以师承为重，矩尺弗违，则五经只应有五师耳，《易》本商瞿，何以分为施、孟、梁丘？《诗》本子夏，何以分为齐、鲁、韩？此见其不守师承，故有争端也。安得有十四博士乎？古文之训诂，如《周礼》杜及大郑等注，在今日视之为平常，不知当时凿山通道，正自不易。盖此诸家未言章句义理，惟求其字句之通，正如今日校勘家，彼此参稽以求通其所不可通。迨其左右采获，征结尽解，则豁然确斯而不可变，非如今日专执小学以说经者，必欲皮傅形声，舍其已通者而为之别求新说也。此训诂之所以是重，而非穿求崖穴者所可拟矣。近代训诂家如惠、戴、段、王，皆得古人正脉；其后以小学说经者，则多穿求崖穴矣。训诂既通，然后有求大义者，异义所载是也。然贾、马、许、郑皆古文，而说亦有异，此正与十四博士之异义相似。今古文皆然，何独谓古文不重师承乎？今观廖氏所论，其于《公羊》，则不取劭公日月之说，即董生《繁露》，亦有不满意，且并王鲁之说驳之，则大义亦与先师迥异；而犹谓今文重在师承，恐已于今文，已不能重师承矣。若曰吾所言者与经悉合，经旨自如此，故不敢屈经以从先师也，则何责于古文家哉？若曰吾所言者独合于经，而古文家独否，则深于古文者，亦正有辞以御之耳。至不守先师微言大义之师承，而独守经皆完书之师承，则仰梁自思，当亦觉其可哂矣。

总之，廖氏之见，欲极崇孔子，而不能批郤导窾，以有此弊。寻其自造六经之说，在彼固以为宗仰素王，无出是语，而不知踵其说者，并可曰孔子事亦后人所造也。噫嘻！槁骨不复起矣，欲出与今人驳难，自言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固不可得矣；则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邪？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邓析之杀求尸者，其谋如此；及教得尸者，其谋如彼。智计之士，一身而备输墨攻守之具，若好

奇爱博，则纵横错出，自为解驳可也。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耶？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乌呼！廖氏不言，后之人必有言之者，其机盖已兆矣。若是，则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之渐，可不惧与？

观廖氏书，自谓思而不学，又谓学问三年当一小变，十年当一大变，知其精勤虚受，非卤莽狂仞者比。今于尊崇孔子一案，既为解明如此，则诸论皆不必发。吾甚愿廖氏之大变也。若夫经术文奸之士，借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者，则埴井之鼃，吾弗敢知焉。

（录自《亚东时报》第18号，1899年11月23日）

参考文献：

廖平：《今古学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江翰：《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中国学报》，1912年第2期。

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郜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77本第1分，2006年。

新史学

梁启超

第一章 中国之旧史学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史学	第一	正史	{ (甲) 官书 所谓“二十四史”是也。 (乙) 别史 如华峤《后汉书》、习凿齿《蜀汉春秋》、《十六国春秋》、《华阳国志》、《元秘史》等，其实皆正史体也。
	第二	编年	《资治通鉴》等是也。
	第三	纪事本末	{ (甲) 通体 如《通鉴纪事本末》、《绎史》等是也。 (乙) 别体 如平定某某方略、《三案始末》等是也。
	第四	政书	{ (甲) 通体 如《通典》、《文献通考》等是也。 (乙) 别体 如《唐开元礼》、《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等是也。 (丙) 小纪 如《汉官仪》等是也。
	第五	杂史	{ (甲) 综记 如《国语》、《战国策》等是也。 (乙) 琐记 如《世说新语》、《唐代丛书》、《明季稗史》等是也。 (丙) 诏令奏议 《四库》另列一门，其实杂史耳。

史学	第六 传记	(甲) 通体	如《满汉名臣传》、《国朝先正事略》等是也。
		(乙) 别体	如某帝实录、某人年谱等是也。
	第七 地志	(甲) 通体	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是也。
		(乙) 别体	如纪行等书是也。
	第八 学史		如《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等是也。
	第九 史论	(甲) 理论	如《史通》、《文史通义》等是也。
		(乙) 事论	如历代史论、《读通鉴论》等是也。
		(丙) 杂论	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第十 附庸	(甲) 外史	如《西域图考》、《职方外纪》等是也。
		(乙) 考据	如《禹贡图考》等是也。
		(丙) 注释	如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是也。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某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君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争其甘苦；狙公饲狙，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

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即各体莫不皆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竟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藉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

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茫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干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泰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去，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罅漏正多。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国史学智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

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著此以代钞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